

农民工

周刊

责任编辑: 甘皙
E-mail:grbnmgzk@163.com

用人单位不履行集体合同怎么办?

案例

玩具厂工会与玩具厂经集体协商签订了集体合同,约定职工工资按企业上一年利润同比例增长。但玩具厂扩大再生产需要用钱,就没有按集体合同约定给职工涨工资。玩具厂工会与玩具厂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企业拒绝执行。于是,玩具厂工会依法申请仲裁。仲裁裁决支持了工会的请求。

《劳动合同法》规定,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因此,玩具厂工会可以与玩具厂就履行集体合同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玩具厂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评析

集体合同的订立程序一般是:

(1)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拟订集体合同草案。
(2)合同草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3)将讨论通过的集体合同草案由工会代表企业职工与用人单位订立;尚未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由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推举的代表与用人单位订立。
(4)集体合同订立后,报送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15日内未提出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如果因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劳动者除了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以外,还可以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提起诉讼等方式解决争议。

用人单位如违反集体合同,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工会可依法代表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整理/制图 甘皙

2020年湖南平均工资出炉

本报讯(记者王鑫 方大丰)近日,湖南省统计局发布2020年湖南省劳动工资年报。数据显示,在疫情冲击下,不论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私营单位,湖南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均实现较快增长,增速甚至超过2019年水平。

数据显示,2020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9122元,相比2019年增加4806元,同比增长6.5%;其中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82356元,同比增长6.2%。全省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6423元,比2019年增长10.5%。

分行业门类看,湖南的非私营单位中,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卫生和社会工作、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私营单位中,则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平均工资最高,金融业次之,卫生和社会工作排在第三。

分区域看,去年湖南各市州之间工资水平差距较为明显。以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为例,长株潭地区(长沙、株洲、湘潭)年平均工资93059元,工资水平最高,增速最快;大湘西地区(湘西自治州、怀化、张家界、邵阳、娄底)的工资水平与增速均居次席,年平均工资69152元;湘南地区(衡阳、郴州、永州)年平均工资68552元;洞庭湖地区(岳阳、常德、益阳)工资水平和增速相对较低。

统计数据显示,上述四大区域的最高与最低年平均工资差距同比有所扩大。2019年是22319元,2020年则扩大到25250元。

原生家庭跨越城乡 为融入城市带来更多挑战

进城打工解决就业的同时也伴随流动的苦恼,专家呼吁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

本报记者 刘小燕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住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的李蓉和丈夫、女儿一起在家包粽子吃。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这样的节日往往都是三人一起庆祝,这是繁忙工作中难得的温馨,也让她时常怀念儿时和弟弟妹妹们更加热闹的团聚氛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进一步跌破三人底线。而家庭户均规模变小在农村家庭表现得更加明显。除了代际更替中生育意愿变化外,专家指出,其原生家庭实际在城乡之间发生了延展,相关政策应该为新市民融入城市提供更多支持。

在代际更替中生育意愿发生变化

李蓉的老家在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调关镇革家铺村,左右邻居都是自家的叔叔伯伯,从小在大家族氛围中长大。1982年出生的她是家里的大姐,后来两个妹妹和最小的弟弟出生。

由于家中经济条件有限且姊妹众多,李蓉15岁时就跟着亲戚到广东虎门的家具厂打工。在广东辗转不同流水线务工多年后,李蓉在顺德的电子厂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随后定居在了丈夫的老家湖南。她的两个妹妹也循着这样的轨迹,读完职高后去上海或广东打工,然后跟随丈夫分别定居在安徽合肥和广东珠海,弟弟则是研究生毕业后定居武汉。

经历过早期教育资源的紧张,李蓉和弟弟妹妹们成家之后,都希望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质量,而不是盲目增加生育。她说,“以前生孩子怎么养并不看重,但现在养育比生育更重要,而且抚养压力也明显上升。所以,我们姊妹四个目前都只生了一个孩子,觉得与其生得多,不如专注提高培养的质量。”

李蓉同时提到,如果要生二胎,也会首先尊重

阅读提示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进一步跌破三人底线。而家庭户均规模变小在农村家庭表现得更加明显。除了代际更替中生育意愿变化外,专家指出,其原生家庭实际在城乡之间发生了延展,相关政策应该为新市民融入城市提供更多支持。

女儿的意愿。

对于从重“量”到重“质”的观念变化,胡贤也深有体会。

和李蓉一样,胡贤也是一名出生于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农村的80后,弟弟胡富比他小4岁。在深圳买房定居后,胡贤的女儿也在深圳接受教育,他说,“女儿现在学的很多知识我都没接触过,怕教错也不敢教,在教育上花的心思比我们小时候复杂多了。”而这一番经历,也让他暂时打消了生二胎的想法,而是全力做好女儿教育的后方保障。

原生家庭跨越城乡空间

在生育意愿变化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比其父辈生育孩子数量要少。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进程则从空间上分离了原本的家庭规模,使得户籍人数也在发生变化。随着青年们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工作或定居后,代际之间的空间分离越发明显。

胡贤在深圳定居后不久,在外读书多年的弟弟也考上了公务员,毕业后去往相邻老家的鄂州市工作,户口也随之迁往不同的城市。兄弟俩在逢年过节或放假的时候,才有时间回到老家和父母团聚。胡贤说道,“现在购房先要落户,升学也引导落户,原来老家的户口本上有4个人,现在就只剩下父母的两页。”

对这种原生家庭子女分散的状态,李蓉也感触颇深。

姐妹三个出嫁后都跟随丈夫在外省定

居,早已经拥有各自小家庭的户口本,弟弟成家之后户口也迁往了武汉,姊妹4人分散在几个不同的省份。

户口分离构成了统计事实上的规模变小,但家庭观念仍然凝聚着原本的家庭人口。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磊明指出,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流动特征,使他们的家庭规模在变小的同时,呈现出独特的延展性。“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原有的家庭会变成一个在城乡之间延展的家庭,它跨越了城乡之间的空间。”

而流动带来的空间跨越,实际上也给予了家庭迁移和融合的新机会。原本土生土长于山西朔州的马杰一家,就逐渐将家庭迁移到了山东青岛。1989年出生的马杰还有两个姐姐,大姐跟随丈夫就业迁移定居在了青岛,二姐一直在北京工作、租房生活。2017年,大姐生孩子后,马杰的父母前往青岛照顾女儿,后来就留下来帮忙带孙子。

为了尽可能地团结原生家庭的亲缘关系,马杰索性也将工作地点选在了青岛。工作三年后,他用自己的积蓄和父母的资助,终于在青岛定居买房。如今,一家人的生活范围已经完全由山西转移到青岛,不仅父母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姐弟三人也方便相互帮助。

融入城市的同时面临其他压力

尽管马杰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原生

家庭的成员们在新城市重聚,但对大多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青年来说,更多的还是和李蓉、胡贤一样处于各自建立小家的分隔状态。

董磊明认为,家庭户均规模变小不仅仅是统计学上的数字变化,更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体发生的事情。

对此他认为,影响农村家庭户均规模的一个直接因素就是生育观念的变化。一方面,现代社会的香火观念已经逐渐淡化,尤其是农村的年轻人在生育态度上也更加开放;另一方面,代际关系变得更加松散,这意味着即便部分老一代人持有传统的生育观念,也很难影响到年轻人的生育决策。“再加上抚养成本和压力的增加,农村青年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同时,董磊明也提到,家庭户均规模的变小会使得当前的养育压力相对轻松,但劳动者以后的社会负担会很重,尤其是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更为显著,“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就是异地就业的流动性,那么一旦老家的父母生病了,同时城市的工作生活需要处理,就需要他们跨地域赡养。”

而这也是李蓉和胡贤目前最担心的问题,空间流动的便利性为子女解决了就业困境,也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但留在老家的父母如何赡养又成为了新的难题。

对此,董磊明认为,新市民的城市融入承担着很大的城乡联结的压力,他们既要面对小家庭在城市生活的孤独感,又要花精力去应对类似春运的流动苦恼。“因此,在政策上给予针对性的关照就显得非常迫切,需要有有效推进教育、医疗、职业技术等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

李蓉也表示,尽管现在会怀念儿时大家在一起时的热闹,但终究要回到现实生活,努力让家人在城市的生活更加美好。



万亩荷塘“双抢”忙

6月20日,务工者在柳江区百朋镇怀洪村的荷塘内劳作。

广西柳州市柳江区百朋镇万亩荷塘种植的春季莲藕迎来丰收。连日来,务工者紧抓农时,抢收春藕、抢种夏藕,荷塘内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黎寒池 摄)

内蒙古“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清零

人年数均13万以上,总体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年均保持在245万人以上。

2012年以来,内蒙古累计开展补贴性培训263.5万人次,拨付补贴资金24.85亿元,技能人才总量由125.3万人增加至279.6万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20.7亿元,培育打造创业园和孵化基地364家,5个孵化基地被认定为

国家级示范基地。

与此同时,内蒙古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2012年的1228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570.6万人,工伤保险从248.9万人增加到336万人,失业保险从232.8万人增加到276.5万人,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

“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由2012年的1730元,增加到2020年的2715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由55元增加到133元,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待遇水平也有较大增幅。”内蒙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毕涛说。

截至目前,内蒙古将40.18万已脱贫人口纳入低保保障,1.6万已脱贫人口纳入特困人员保障,实现了“不落一户、不落一人”的目标。2021年以来,内蒙古累计实施临时救助7.38万人次,支出临时救助资金9681.3万元。

北京138家职业培训机构有了合同示范文本

为消费者设置7天冷静期,对保过、证书挂靠等不规范行为予以特别提示

范文本,致力于解决培训机构利用夸大培训效果销售、利用服务合同格式条款妨碍消费者主张个人合法权益等问题。

本次发布的专技类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主要明确了适用范围、权利义务关系、培训服务计划和收费资金保障措施,对双方的违约责任、退费条款、争议处理等内容作了详细约定。为了预防和减少因冲动消费引发的纠纷,还为消费者设置了7天冷静期。如果消费者已经签订培训合同并付款,但只要在7天内没有参与培训,即可无条件解除合同并全额退款。同时,服务合同示范文本还针对

培训服务的不规范行为予以特别提示,如保过、包过、代报名、证书挂靠等,切实维护合同双方合法权益。

当天,北京市人社局还向各区集中部署了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推行工作,要求各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监督指导专技类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协调各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时查处合同使用中出现的格式条款违法行为;做好宣传推进工作,积极引导消费者与培训机构签订示范文本。

据介绍,目前北京全市专技类的营利性

职业培训机构共有138家。当天,北京市人社局还向这些培训机构发出了使用合同示范文本、依法合规经营的倡议,希望培训机构做到“诚实守信、规范有序、防控风险、服务争先”。81家参会培训机构代表承诺,从即日起使用培训合同示范文本,依法合规经营。目前,这81家专技类培训机构已经覆盖全市近90%的培训量。

下一步,北京市人社局还将从完备台账、强化监督、化解风险、综合执法四个方面,重点推进培训监管工作,对违反承诺的培训机构,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予以查处。